

郑樵校雠学说研究的民国转向

谢 欢

摘 要 对于郑樵校雠学的研究在民国时期出现了“转向”，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重视程度。郑樵校雠学说在民国以前鲜为人重视，从民国开始对其重视程度显著增加，并逐渐将其作为一门专科之学来研究。第二，研究倾向。民国以前对于郑樵本人及其学说多是以一种负面的眼光去看待，民国以后，对于郑樵校雠学说的研究出现了新旧两派学者，旧派学者以余嘉锡、向宗鲁、刘咸炘为代表，他们的研究延续了以往负面评价为主的倾向。不过，旧派学者中也有姚名达等，给予郑樵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新派学者以杜定友、钱亚新为代表，他们从图书馆学的视角切入，对于郑樵校雠学说给予了较高的评价。郑樵校雠学说研究之所以在民国时期发生转向，是因为其学说中敢于打破传统、“求简”等思想契合了民国社会、学术发展潮流。表1。参考文献39。

关键词 郑樵 目录学史 民国 图书馆学史 钱亚新

分类号 G257

The Turning of the Research on ZHENG Qiao's Bibliography Thought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XIE Huan

ABSTRACT

Bibliography practice has a long history in China while the systematic theoretical summarization on that hadn't been produced until South Song Dynasty. ZHENG Qiao, a famous scholar of South Song Dynasty, wrote a book titled *Tong Zhi Jiao Chou Lue* and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d the theory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practice. Therefore *Tong Zhi Jiao Chou Lue* is considered the first theoretical monograph on bibliography in China. Chinese traditional bibliography and modern library science have a close relationship. Studying ZHENG Qiao, the representative scholar in Chinese bibliography history, contributes to the indigenization of librarianship. In this article, the main research methods are comparing relative texts on bibliography.

ZHENG Qiao is a controversial figure. Although his works have a great influence, his status and reputation were bad during his life and a long period after his death. This situation began to change in the era of Republic of China. Owing to the efforts of GU Jiegang, the academics started to evaluate ZHENG Qiao and his thoughts with a positive attitude. There were two turnings of the research on ZHENG Qiao's bibliography thought in the era of Republic of China. Firstly, according to the incomplete statistics, before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re were only two scholars HU Yinglin and ZHANG Xuecheng studied ZHENG Qiao's bibliography thought. But since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re were more and more scholars studying ZHENG Qiao's bibliography thought and treating it as a special discipline. Secondly, the research attitudes about ZHENG Qiao's bibliography thought gradually

通信作者：谢欢，Email: weizhaizhuren@163.com, ORCID:0000-0003-3883-2382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XIE Huan, Email: weizhaizhuren@163.com, ORCID:0000-0003-3883-2382)

changed. During the era of Republic of China, the scholars who were interested in ZHENG Qiao's bibliography thought c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first one, could be called the conservative, such as YU Jiayi, XIANG Zonglu, LIU Xianxin etc. who took China's traditional academic training. The conservative evaluated ZHENG Qiao's bibliography though still with a pejorative attitude. But in the conservative group, there were a few scholars such as YAO Mingda who studied ZHENG Qiao's bibliography thought objectively. The other group, mainly consisted of the scholars who took the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such as DU Dingyou and QIAN Yaxin, could be called the new. They studied ZHENG Qiao's bibliography thou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brary science and highly praised ZHENG Qiao's bibliography thought. The impact of the new group's research conclusion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conservative group. The turnings of the research on ZHENG Qiao in the era of Republic of China were also due to his unconventional ideas and pursuit of simplicity, which met the social and academic trend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 tab. 39 refs.

KEY WORDS

ZHENG Qiao. Bibliography history. The Republic of China. Library history. QIAN Yaxin.

0 引言

中国文献典籍浩如烟海,在二千余年的文献发展史中逐渐形成的古典目录学已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典目录学在中国古代多笼统地以校讎学称之,狭义的校讎学接近于校勘学,本文的校讎学是指包含校勘、版本等内容的广义校讎学,非做特殊说明,本文的目录学也是指广义的目录学,与校讎学互用。目录学源于目录工作,“目录学”名称虽然出现得较晚,但是我国的目录工作却是源远流长。有学者认为商代出现的甲骨文献排列的现象就蕴含了目录工作的雏形,而春秋时期孔子整理古籍、删定“六经”,其中也蕴含着目录工作的一些内容^[1]。不过学界公认的,我国真正的系统的目录工作还是源于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校订群书,编撰《别录》《七略》,此后《汉书·艺文志》《中经新簿》《七录》《隋书·经籍志》《崇文总目》等不断发展,特别是到了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的编撰,使得我国古代目录工作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然而,中国古代不管是官修书目还是私人书目,不管是综合目录还是专科目录,其编撰方法在发展中虽不断趋于完善,但始终缺少足够的理论总结,当然这或许与我国古代学术传统有关,

“吾国学术,素乏系统,且不注意于工具之述作,各家类然,而以目录为尤甚。故自来有目录之学,有目录之书,而无治目录学之书”^{[2]7}。不过“无治目录学之书”的情况,到了南宋终于得到改善。南宋时期的郑樵,第一次对我国目录学作了系统的理论探讨,撰写了《通志·校讎略》,从“秦不绝儒学、编次必谨类例、求书遣使校书久任、求书之道有八、泛释无义”^[3]等二十一论对文献的搜集、分类、编次、典藏等作了比较系统的总结,有学者指出“我国学术界,将校讎写为专著,是从郑樵所写《校讎略》开始的”^[4]。然而自郑樵歿后,其思想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民国时期,郑樵的思想学说才重新焕发生机。

1 民国以前郑樵及其校讎学说研究回顾

1.1 民国以前郑樵研究

郑樵(1104—1162),南宋著名的史学家、藏书家、文献学家,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在经学、史学、文献学、天文地理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郑樵穷毕生之力综合历代史料所撰的二百卷《通志》,开创了一种新的著史体例,广为后世因袭(如《续通志》《清朝通志》《广校讎略》等),后人也将其与唐代杜佑的《通典》、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并称为“三通”,影响极为深远。

当下提及郑樵,基本形成正面共识,认为他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位著名学者、思想家。然而在郑樵生前及其去世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郑樵一直是一个富有争议的人物。如陆游就评价郑樵“好古博学,诚佳士也”,但也指出郑樵“朝论多排诋之,至三馆借书,故馆中尤不乐”^[5],可见人际关系之差;郑樵同时期的周必大虽然也认为郑樵“平生甘淡泊,乐施予”,但却批评他“成书虽多,大抵博而寡要”“独切切于仕进。识者以是少之”^[6]。《宋史·郑樵传》就直接采纳了周必大对于郑樵的评价^[7],其中“博而寡要”“独切切于仕进”等论断奠定了后世负面评价郑樵的基调。如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就评价郑樵“樵之学虽自成一家,而其师心自是,殆孔子所谓不知而作者也”^[8]。元代的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也认为郑樵“高自称许”“无所发明”“全无学识、专事剽窃”“不堪检点”^[9]。而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是对郑樵进行了批判,“盖宋人以义理相高,于考证之学罕能留意,樵恃其该洽,睥睨一世,谅无人起而难之,故高视阔步,不复详检,遂不能一一精密,致后人多所讥弹也”,认为郑樵所著的《通志》也是“矜奇炫博,泛滥及之”“无所取”“多挂漏”“未能详核”^[10]。不过郑樵生六百载之后,出现了一位“知音”章学诚,章学诚著《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两书,对郑樵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释,对前代加于郑樵身上的诸多微词进行了辩护,认为郑樵“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所以学者少见多怪,不究其发凡起例,绝识旷论”^[11]。总体而言,民国以前,对于郑樵其人的研究并不多,而就有文献来看,主要也是以负面评价为主。

1.2 民国以前对郑樵校雠学说的研究

从上可知,民国以前对于郑樵的研究并不多,而对于郑樵校雠学说的研究也是几乎没有,据有关学者统计,民国以前对郑樵校雠学说有过专门研究的只有胡应麟、章学诚二人^{[12]307-317}。

胡应麟是较早研究郑樵校雠学说的学者,其对于郑樵校雠学说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经籍会通》一书中。从该书论述来看,胡应麟对于郑樵《校雠略》《艺文略》评价颇高,认为《校雠略》“发前人未发,后学当熟参考者”,《艺文略》“该括甚巨,剖核弥精,良堪省阅”。对于郑樵校雠学说的具体内容,胡应麟主要涉及如下几个方面:①对于郑樵《艺文略》打破四部分类予以认可,但是认为具体的类目设置存在不妥,诸多内容抄袭前人,“不复稽核”,且归类混乱,“有无多寡,混为一谈”,以致存在诸多问题,有“大误后学”之失。②对于郑樵的“求书八法”,认为是“曲尽求书之道”,但是胡应麟认为郑樵的求书八法只适用于搜求年代较近的文献,时代较远的典籍无法搜集。③批评郑樵著述带有“成心”,认为郑樵对于班固的批评“其论已过”。④批评郑樵的“泛释无义”著录思想,认为这样会导致“昔人著作之旨亡所发明”^[13]。总体来看,胡应麟对于郑樵校雠学说的研究重点在于《艺文略》中每一类目下的具体内容,对于郑樵校雠学说的主旨,并未深入阐发。

章学诚对郑樵校雠思想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其《校雠通义》一书中。章学诚赞扬郑樵将校雠的重点放在“部次条别,疏通伦类,考其得失之故”,因为这与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意旨是一致的。但是章学诚对郑樵《校雠略》中对于班固《汉书·艺文志》“过为贬驳之辞”以及其他“过于骏利”的言论进行了批判,对郑樵不能真正领略刘向、刘歆父子校雠微旨特撰写“宗刘”一节给予阐发,而对郑樵提出的求书、守书等方法也进行了补充^[14]。从章学诚对郑樵的研究来看,其对郑樵评价颇高。然而由于章学诚的长期“湮没”(章学诚其人其学也是到民国时期才引起学界重视),这些内容到近世才被人发现并重新审视。

2 民国郑樵校雠学说研究回顾

2.1 民国郑樵研究的兴起

民国以降,随着章学诚著作逐渐被重视以

及顾颉刚等学者的积极宣扬,学界逐渐意识到郑樵的价值,也越来越多地从正面评价郑樵,这些评价影响至今。民国学者之中,顾颉刚是比较早地对郑樵开展系统研究的学者。1923年,顾颉刚在《国学季刊》发表《郑樵著述考》,该文不仅罗列郑樵的论著,而且在每部书之后辑录其他学者著作中对郑樵该书的评论。顾颉刚认真研读郑樵及后人评述后,认为“郑樵的学问,郑樵的著作,综括一句话,是富于科学的精神”^[15]。同年,继《郑樵著述考》之后,顾颉刚又在《国学季刊》上发表了为郑樵正名的长文《郑樵传(1104—1162)》,在文中顾颉刚不仅再一次赞扬了郑樵所具备的科学精神,而且指出“郑樵是中国历史上很可注意的人。他有极高的热诚,极锐的眼光,极广的志愿去从事学问。在谨守典型又欠缺征实观念的中国学界,真是特出异样的人物”^[16]。这篇《郑樵传》是我国学术史上关于郑樵的第一篇长传,此后顾颉刚又发表了《郑樵诗辨妄辑本》等研究专文。顾颉刚关于郑樵的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郑樵传》对于学界重新认识、评价郑樵产生了重要的助推作用。如陈久志在《郑樵的治学方法》一文开头便说“顾颉刚先生把他(郑樵——笔者注)的著作表彰出来,并且为他作了一篇很详的传,于是这位大学问家的事迹,我们方才完全晓得。”^[17]。

得益于顾颉刚的推动,学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真、全面地研究郑樵。不过,当时对于郑樵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史学、经学方面,这从顾颉刚的研究也能看出。以《郑樵著述考》为例,顾颉刚重心明显偏向于郑樵的“经旨之学、礼乐之学”,对于“校雠之学”在内的其他诸学,顾颉刚所作“案语”(实为顾氏对郑樵及前人研究的一种评价)极少。另外,从该文对郑樵的著述门类划分,也能反映这点。顾颉刚将郑樵的“经旨之学、礼乐之学”排在第一、第二,而“校雠之学”则排在第七^[15]。由于顾颉刚此文辑录有前人对郑樵相关著作的研究成果,因此从著录的情况也可看出前人对于郑樵校雠之学不够重视。而上文提到的陈久志的《郑樵的治学方法》一文实

际也是探讨郑樵的史学研究方法。但是随着对郑樵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图书馆学的兴起与发展,郑樵的校雠学说越来越多地被人关注。

2.2 民国郑樵校雠学说研究回顾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西学东渐的大潮,中西文化交流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古典目录学研究出现了新的视角。古典目录学特别是经过乾嘉学者发展后的古典目录学,其重心越来越偏向于考订文献的版本、文字的讹误异同,即研究作品(Works)本身,而忽视了作品中的问题(Issues)^[18]。不过不容否认的是,经过乾嘉以后,目录学逐渐以一门独立的学科姿态屹立于学术之林。民国时期,尤其是民初,不少学者如向宗鲁、刘咸炘、余嘉锡等,或多或少仍然沿袭乾嘉范式研究古典目录学。不过这其中也有一些学者吸收了西方新学来研究古典目录学,如姚名达等人。然而随着中国教育的普及、现代学术的发展以及印刷出版技术的进步,文献流通越来越广,普罗大众对于文献的需求越来越多。同时得益于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及图书馆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工作者开始利用图书馆学的知识与方法研究目录学,如杜定友、钱亚新等。具体而言,民国以降,我国古典目录学研究逐渐形成如下四种研究视角^[19]:①研究目录之渊源或考证一书版刻之历史;②比较版本之异同得失;③研究文献分类、编目、解题书目提要等;④研究介于新旧之间。上述四种研究视角,很好地反映了民国时期新旧学术之间的碰撞,其中①和②无疑属于“旧”派研究,③则属于“新”派。其实,我国传统目录学中也有分类、编目,郑樵、章学诚等人的论著中就涉及分类义例、编目义例等内容,但由于西方图书馆学知识的东渐,这一部分内容得到了新的融合与发展。而民国时期对郑樵校雠学说的研究很好地体现了这新旧学者的不同风格。

2.2.1 “旧派”学者研究郑樵校雠学说概述

上文已经提及,民国时期对于郑樵校雠学说的研究有旧派、新派学者之别。所谓的“旧

派”学者,是指具有扎实文史功底的从事传统学术(经、史、子、集)研究的学者。“旧派”学者对郑樵校雠学说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并未出现专著,也未有专门的学术论文,多是在著作中以一节或一段评述。从这些内容来看,“旧派”学者对郑樵校雠学说的研究呈现出两种倾向,一是有褒有贬,但以贬为主;二是褒贬相当。

(1)“以贬为主”的研究

“旧派”学者大多继承了以往对于郑樵的种种“偏见”,因而在涉及郑樵校雠学说时,不少都给予了严厉的批判,其中以余嘉锡、刘咸炘、向宗鲁最具代表性。

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中虽然有部分称赞郑樵之语,但大多还是以批评为主,特别是对郑樵过分夸大类例的作用以及不了解分类实践而妄论,给予了猛烈的批判^{[2]14-18,144}。刘咸炘在《续校雠通义》中特撰《纠郑》一篇,批评郑樵为学“好高视独断而不知循源流师承”,“《校雠略》中多大言失考”,刘咸炘重点批评了郑樵的分类“重复”“大小不伦,详略不均”“妄立不通”,而且指出郑樵的类例有抄袭《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之嫌^[20]。向宗鲁很好地代表了以狭义的视角认识校雠学的民国“旧派”学者。在这类学者看来,郑樵所谓的校雠学,只是假借“校雠”之名,实则相距甚远。向宗鲁在《校雠学》一书中指出,“郑樵、章学诚之流《通志·校雠略》及《校雠通义》之流。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者,特为甲乙簿录语其宗极,而冒尸校雠之名,翻其反矣。”“若以郑、章之肤言,穷校雠之能事,则类聚群分,撮其指意,期年可必,何以为累世之业乎?”“彼踵武郑、章者,乃欲以蹈虚之业,易征实之功”^{[21]1-2,13},言语间向宗鲁对于郑樵、章学诚的鄙薄之意尽显无疑。向宗鲁认为,真正的校雠是向歆父子那种“聚本、去复、正讹、补脱、异文、别义、编次、定名”^{[21]26-30}的工作。由此表明,在向宗鲁这类学者看来,校雠学就是校勘学。客观而言,郑樵的校雠学说是在向宗鲁等人所认识的狭义的校雠学基础上的一种深

化、拓展,将校勘、目录、版本都融为一体,代表了校雠学发展的新高度,所以说向宗鲁对郑樵的批判值得商榷。

(2)“褒贬相当”的研究

民国“旧派”学者中,也有不少学者比较客观地评价郑樵,如胡朴安、胡道静在《校雠学》一书中认为我国的校雠工作虽由来已久,但校雠之学直到宋代才真正产生,而这与郑樵有着密切的关系。郑樵的《校雠略》是我国第一部论述校雠的专书。同时,也指出“其大旨谓谨编次部目,则图书可免亡失。因详论编次之法,于刘班、隋志、崇文总目皆为驳诘。虽未尽精密,要筭路蓝缕之功,不可没也。”^[22]又如汪辟疆,在《目录学研究》中提及郑樵时,称赞其具有“淹博之才,横绝之识”,是一位“专门部录之改革者”,但是,在涉及具体的特别是郑樵的类例思想时,汪辟疆又进行了批评,认为“其所区部类,颇有近于繁琐,分划无当。……惜郑氏恃其睨睥一世之才,高视阔步,不能详检其类目,商榷其分隶,往往不能精密,致后人多所讥弹,则渔仲之失也”^[23]。再如蒋元卿在《校雠学史》书中承认宋代以前我国有校雠之学,但无校雠之书,郑樵《校雠略》一书为我国校雠专书之滥觞。蒋元卿认为《校雠略》“书中特于类例编次之法,详加讨论。而于刘略班志隋志以及《崇文总目》之谬误,皆为驳诘纠正。虽未能尽阐无遗,然其筭路蓝缕之功,诚不可泯”^[24]。

综观20世纪40年代以前的“旧派”学者,姚名达是比较全面、客观评述郑樵校雠学说的人。他在《中国目录学史》一书中,高度评价了郑樵打破传统四部分类法的“胆量之巨,识见之宏,实旷古一人”,认为郑樵《校雠略》中对于求书、校书、编目等内容的叙述,也多有发古人未发之议。而姚名达尤为赞赏的是郑樵对于图画表谱的重视,认为“自古提倡图画表谱者,意识最精,出力最大,固未有逾郑樵者也”。但是姚名达也批评了郑樵校雠学说中的不足,指出郑樵“语多武断”,且在姚名达看来,郑樵“所长者,非群书之部次,乃分类之理论耳”,但郑樵提出

的类目设置却较为繁琐^[25]。姚名达虽然指出郑樵的诸多不足,但从其论述、用词来看,远没有刘咸炘、向宗鲁等人的那股戾气,读起来平和舒缓,客观公正。姚名达出身清华国学院,受业于梁启超、王国维等人,也属“旧派”学者,但是姚名达在清华期间除了接受传统的学术训练外,更多了一副“西学”眼镜,将部分西方学说融合进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之中,从《中国目录学史》一书可以看出,他的视域明显宽于传统“旧派”学者,除了传统的古典目录学知识外,还有很多现代图书馆学内容,因此他对郑樵校雠学说的认识也就更为全面。

2.2.2 “新派”学者研究郑樵校雠学说概述

民国时期研究郑樵校雠学说的群体中有一类“新派”学者,所谓的“新派”学者主要是受过现代图书馆学教育的群体。随着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图书馆界学者逐渐意识到“目录学(Bibliography)其源甚古,与图书馆学(Library Science)虽有密切之关系,实为二种科学。各有其独立性。研求目录学者故无需知图书馆学;而研求图书馆学者却不能不知目录之门径”^[26]。早在1925年,梁启超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之日的演说中就呼吁图书馆从业人员“必须要对中国的目录学和现代的图书馆学都有充分智识”^[27]。由于中国图书馆界大多数学者都是接受的西方学术训练,因此多是以一种现代图书馆学的视角去研究古代目录学。杜定友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我国学术向病庞杂,目录之学亦复患此。近来欧化东渐,图书之学,成为专门,取其成法融会而贯通之,亦我国言校雠者之责也”^[28]自叙,这段话很好地反映了当时图书馆界学者研究校雠学的一种心态与路径。

新派学者主要从20世纪30年代介入古典目录学的研究,此后古典目录学也一直成为图书馆学的重要研究方向。在研究郑樵校雠学说的“新派”学者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杜定友和钱亚新师徒,尤其是钱亚新。杜定友的《校雠新义》是典型的以现代图书馆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我国传统校雠学的著作,在书中杜定友虽然从现代分类、

编目的视角指出郑樵校雠理论的不足,但是总体而言,杜定友对郑樵还是颇为赞赏的,认为郑樵《校雠略》“论部次之得失,意至善也”“郑氏之言,可谓深明乎分类之法矣”“郑渔仲论求书之道,谓典籍中之经济矣”^[28]自叙,11,54。

钱亚新是继姚名达之后,对郑樵校雠学说研究最为系统与全面的学者,他对郑樵校雠学说的研究体现在194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郑樵校雠略研究》一书中,作为民国时期出版的最后一本目录学著作^[29],《郑樵校雠略研究》一书是我国第一部,也是民国时期唯一一部系统研究郑樵校雠学说的专著,该书也很好地代表了图书馆界人士对于中国古代校雠说的认识。钱亚新《郑樵校雠略研究》一书以郑樵《通志》二十略中之《校雠略》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艺文略》《图谱略》《金石略》,他在开篇研究范围中明确指出“本文的研究范围是《校雠略》,而所谓《校雠略》,就是研究与图书有密切联系的各种学问的纲要”^[30]2-3,17,97,118,这一定义已经远远超过了传统的校雠学或目录学的范围而更近似于图书馆学,而书中具体的论述也随处可见图书馆学的身影。

钱亚新通过对郑樵类例、编目、“求书八法”“广搜无遗”“设官专守”“求书遣使校书久任”“专人治专书”等理论的研究,认为郑樵的这些观点虽然有不完善之处,但总的来说还是非常具有远见的,与后世的图书馆学颇有相通之处,职是之故,钱亚新将郑樵作为我国图书馆学奠基人^[31],并评价郑樵“眼光是远大的、态度是客观的、批评是严格的、方法是实验的、原理是定律的”,《校雠略》“不仅为我国校雠学专书的滥觞,而且是建立这门学问的先锋。又因为其中所具的眼光远大,态度客观,批评严格,兼之方法可以实验,原理合乎定律,所以此书是在为校雠学开辟了探讨的新途径,而使其走向科学研究的轨道。”^[30]109-117不过,不能忽视的是,在《郑樵校雠略研究》一书中,钱亚新对于郑樵校雠学说中的诸多错误或是隐而不发,或是浅尝辄止。如以钱氏上述“态度是客观的,批评是严格的”评

语而论,就有失公允。郑樵对刘班、《崇文总目》等的批评确实是非常猛烈,但是这猛烈的批评多为郑樵武断的言论,讹谬之处甚多,这点不管是章学诚,还是余嘉锡、刘咸炘、姚名达等人在论述中都有所论证,而钱亚新却未发一语,仍然极力赞扬。笔者臆测,这或许有两个原因,第一,钱亚新由于旧学基础薄弱,未像余嘉锡、刘咸炘、姚名达等熟读旧典,因而不能发现郑樵的独断舛误;第二,出于对图书馆学的热爱,为中国图书馆学正名。近代图书馆学毕竟是西方的“舶来品”,然而通过对郑樵校雠学说的研究,钱亚新发现其与图书馆学竟有不少共通之处,这为中国古代存在图书馆学提供了证据。因此,为了提高图书馆学的地位,展现我国古代图书馆学传统的优良性,对郑樵——我国图书馆学奠基人——的错误就不能做过多的阐发。两种原因共同作用,使得钱亚新虽然意识到郑樵校雠学说的不足,但却未做过多议论。

至于“方法是实验的、原理是定律的”评价,显然是受到“五四”及顾颉刚的影响,“五四”时期最大的一股思潮便是“科学”,这股思潮影响至今。顾颉刚《郑樵著述考》《郑樵传(1104—1162)》等研究的核心主旨便在于宣扬郑樵的科

学精神。抗战结束后,钱亚新任教于国立社教育学院图博系,彼时顾颉刚亦在该校任教,并担任图博系目录学课程教师。笔者曾查阅顾颉刚日记,发现顾颉刚1947年5月16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到社教院,向两班学生讲话,未授课。……审查钱亚新《郑樵校雠学》稿。”^{[32]63}钱亚新很有可能吸收了顾颉刚的意见,“方法是实验的、原理是定律的”的评价与“科学”异曲同工。尤其需要指出的,钱亚新明确指出郑樵校雠学说中的“方法”问题,这也是与“旧派”学者的重要区别,包括古典目录学在内的中国传统学术,虽然有一套治学的方法,但是却很少有人明确将其提炼、归纳,而在对郑樵校雠学说研究的学者中,也很少有人注意到“方法”的问题,钱亚新此处明确指出郑樵校雠学说方法,应该说在诸多郑樵校雠学说研究成果中也是一大创新。

2.2.3 “旧派”与“新派”学者对于郑樵校雠学说研究的比较

上文简要地回顾了民国时期学者对于郑樵校雠学说的研究概况,大致能看出一些其中的区别,但是具体来说,“新”“旧”派学者的差别主要体现在表1中。

表1 民国时期“旧派”与“新派”学者研究郑樵校雠学说的区别

学者类别 比较项目	“旧派”学者	“新派”学者
研究时间	主要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	20世纪30到40年代
研究基础	基本都有扎实的文史功底,熟谙中国古代典籍,治学范围囿于经、史、子、集的传统学术研究范畴,部分学者也吸收了一点西学	文史功底较为薄弱,所接受的多为现代西方学术训练(主要是图书馆学教育)
研究范围	以郑樵类例之说为主,兼及一些具体文献的归类	综合研究郑樵校雠学中分类、编目、求书、典藏等内容,同时考察郑樵校雠学说体现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问题
研究重心	从古代典籍内容出发研究郑樵的校雠学说,强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从现代图书馆学视角出发,强调利用、便捷等现代图书馆学所提倡的内容
研究性质	传统文史研究	跨学科的“交叉、融合”研究
研究结论	有褒有贬,但总体呈现以贬为主的倾向	以褒为主

民国时期对于郑樵校雠学说的众多研究中,钱亚新的研究成果对后世影响较大,或许这也是因为钱亚新出版了研究专著。汪长炳评价《郑樵校雠略研究》“议论之宏,涉猎之富”,能够“启牖后学有所借径”^[30]汪序;徐家麟也认为《郑樵校雠略研究》“不仅为研究郑樵《校雠略》的学子们,出现了一本有贡献的著述,而且为我国今后目录学界与图书馆学界,提供一种互相交通的例子”“藉它(《郑樵校雠略研究》一书——笔者注)里面的分析、比较、批评的文字,读者对郑樵的校雠学说,可以窥得其全豹。”^[30]徐序 1982年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联合编写出版的高等院校图书馆学专业教材《目录学概论》认为,“《郑樵校雠略研究》从某一目录学家的著述,进行了深入研究与总结,至今也很有参考价值”^[33];南京大学徐有富教授则认为《郑樵校雠略研究》一书是继章学诚之后对《通志·校雠略》作的“更为全面、深入的研究”^[34];北京大学周余姣博士也指出“《郑樵的校雠略研究》一书是从现代西方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分析了郑樵的《校雠略》的各个方面,对郑樵的校雠学进行了全面的解读,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研究”^{[12]26}。而诸如黄宗忠^[35]、桑健^[36]、况能富^[37]、倪波^[38]等学者在其论著中涉及郑樵的内容时,或是全部、或是部分采纳了钱亚新对郑樵的研究成果。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郑樵同宗后人台湾学者郑奋鹏先生,在1983年出版了《郑樵的校雠目录学》一书,该书在“郑樵校雠目录学的理论、郑樵校雠目录学的实际、郑樵校雠目录学的评价和影响”^[39]三章的章节布局、内容论述、结论等部分,参考了钱亚新《郑樵校雠略研究》中的大量观点,这也很好地说明了钱亚新在郑樵校雠学研究领域的影响。

3 郑樵校雠学说研究的民国转向

综上所述,郑樵校雠学说研究在民国实现了“转向”,所谓的“转向”有两层意思:第一,重

视程度。郑樵校雠学说在民国以前鲜为人重视,从民国开始对其重视程度显著增加,并逐渐将其作为一门专科之学来研究。第二,研究倾向。民国以前对于郑樵本人及其学说多是以一种负面的眼光去看待,民国以后,得益于顾颉刚等人的推动,学界越来越多以一种正面的、积极的观点去评价郑樵。就郑樵校雠学说而言,虽然存在不足,但是其学说中不少内容却符合民国社会、学术发展潮流,因此,这也是其校雠学说在民国时期实现“转向”的重要原因之一。

3.1 敢于打破传统的创新精神

郑樵在《校雠略》中设计了“(总十二)类、(百)家、(四百二十二)种”三级分类体系,这一分类体系,突破了《隋书·经籍志》中“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之藩篱。图书分类是学术发展的直观表现,刘向、刘歆父子创立的“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分法,就是汉朝学术发展典籍增多的直接反映,而此后“经部”逐渐独立成为一个大类也反映了儒学的发展情况。南宋时,我国学术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四大发明中的三项都在宋朝成熟,更是表明了这一时期自然科学取得的成就,而此时如果仍沿用以往的四部分类法,则不能很好地概括当时学术的发展。因此,郑樵勇敢地打破传统,创立新的分类体系。民国时期,西学大肆东渐,东西学术交融愈发快速,尤其是五四以来,对于打破传统,融合西学的诉求已演变为社会主流思潮之一,因此,郑樵这种敢于打破传统、勇于创新的思想契合了当时的社会思潮,得到学界肯定与宣扬。

3.2 符合学术分科背景下知识分类的要求

郑樵在设计分类体系时,明确提出“类例不患其多也”。虽然仔细考究郑樵分类体系中的类目,重复、混乱、矛盾现象非常明显(这也是郑樵为后世,包括民国时期旧派学者攻讦最多的地方之一),但是郑樵认为书分得越详细越好,即“类例不患其多也”。民国时期,尤其是西学

传入后,中国学术分科越分越细,知识门类愈来愈多,为了更精确地划分新的知识,必须不断增加新的类目,这也符合近代图书馆学分类思想要求。因此,这也使得郑樵学说深得学界,尤其是杜定友、钱亚新等深谙西方图书馆学分类法学者大为赞赏。

3.3 “取简”思想

郑樵在《校雠略》中涉及编目、著录内容时,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成类、取简”,具体而言便是“于疑晦者”加注释项目,“无晦者,则以类举”,这一思想对于深受传统目录学影响的旧派学者来说是不大能接受的。因为在传统目录学中,注释是编目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类例一起承担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重要作用。然而郑樵却要求将其简化,仅仅依靠类例来考辨源流,虽然有武断之处,但是其“求简”的思想却适应了民国文献工作的需要。民国时期,得益于印刷术的快速发展,文献典籍数量显著增加,尤其是在传统图书的基础上出现了期刊、报纸等新的文献种类,不管是文献加工人员,还是文献利用人员都希望能“从简”,以提高文献整

理与利用的效率,而郑樵校雠学中的“求简”思想满足了当时文献工作者的需要,因此得到文献工作者(主要是图书馆界人士)的大力赞赏。

4 结语

中国古典目录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与现代图书馆学最为密切的“旧学”。曾几何时,古典目录学一直是中国现代图书馆学最为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杜定友、李小缘、钱亚新等人都努力尝试将二者有效地结合起来。然而,近年来,图书馆学界对于中国古典目录学却越来越疏离,这不得不让人感到遗憾。最后,还是借徐家麟在1947年为钱亚新《郑樵校雠略研究》一书所作序言中的一段话结束全文。“我国固有的目录学,自有其久远精粹的历史。这可说是先哲宝贵的遗产之一,承继这份遗产的,除了目录学者们而外,还应当有经营现代图书馆的学者们。他们双方对此的职责,并不限于单纯的承继而已,更应肩负起发扬光大的任务。”^[30]徐序

参考文献

- [1] 王重民. 中国目录学史论丛[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2-12. (Wang Zhongmin. History of China's bibliography[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4: 2-12.)
- [2] 余嘉锡. 目录学发微[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Yu Jiaksi. An introduction to bibliography[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7.)
- [3] 郑樵. 通志·校雠略[M]. 元大德三山郡庠刻明递修弘治公文纸印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本. 2006. (Zheng Qiao. Tong zhi jiao chou lue[M].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06.)
- [4] 张舜徽. 中国文献学[M]. 河南: 中州书画社, 1982: 254. (Zhang Shunhui. Chinese bibliography[M]. Henan: Zhongzhou Ancient Book Press, 1982: 254.)
- [5] 陆游. 跋石鼓文解[G]//陆游. 渭南文集. 明华氏活字本. 卷三十一. (Lu You. The epilogue of Shi Gu Wen Jie [G]// Lu You. Weinan Wen Ji. Ming dynasty, vol. 31)
- [6] 周必大. 辛巳亲征录[G]//顾宏义, 李文整理标校. 宋代日记丛编.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3: 879. (Zhou Bida. Xin si qin zheng lu[G]//Gu Hongyi, Li Wen. The series of Song Dynasty's diaries.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13: 879.)
- [7] 脱脱, 等. 宋史[M]. 清武英殿本, 卷四百三十六(Tuo Tuo, et al. History of Song dynasty[M]. Wuyingdian edition, vol. 436)

- [8]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北京:中华书局,1985:36.(Chen Zhensun. Zhi zhai shu lu jie ti[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5:36.)
- [9] 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706-707.(Ma Duanlin. Wen xian tong kao jing ji kao[M].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1985:706-707.)
- [10]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十一)[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25-27.(Yong Rong, et al. The essentials of SI-KU-Quan-Shu catalog(11)[M].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1931:25-27.)
- [11] 章学诚.文史通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49-151.(Zhang Xuecheng. Wen shi tong yi[M].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08:149-151.)
- [12] 周余姣.郑樵与章学诚的校雠学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15.(Zhou Yujiao. Zheng Qiao and Zhang Xuecheng's broad-sensed emendation research[M]. Jinan: Shandong Qilu Press Co., Ltd,2015.)
- [13] 胡应麟等.经籍会通[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6,23-28,30,44,54.(Hu Yinglin. Jing ji hui tong[M]. Beijing: Beijing Yanshan Press,1999:6,23-28,30,44,54.)
- [14] 章学诚.校雠通义通解[M].王重民通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Zhang Xuecheng. Jiao chou tong yi tong jie[M]. Wang Zhongmin, anno.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09:1.)
- [15] 顾颉刚.郑樵著述考[J].国学季刊,1923,1(1):96-138.(Gu Jiegang. A study of Zheng Qiao's works[J]. Sinology Quarterly,1923,1(1):96-138.)
- [16] 顾颉刚.郑樵传(1104—1162)[J].国学季刊,1923,1(2):309-332.(Gu Jiegang. Zheng Qiao's biography[J]. Sinology Quarterly,1923,1(2):309-332.)
- [17] 陈久志.郑樵的治学方法[J].南开周刊,1923(65):10.(Chen Jiuzhi. Zheng Qiao's research methods[J]. Nankai Weekly,1923(65):10.)
- [18] 罗志田.经典淡出之后:20世纪中国史学的转变与延续[M].北京:三联书店,2013:5.(Luo Zhitian. The tradition and the change of Chinese History Science in 20th century[M].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13:5.)
- [19] 李小缘.中国图书馆事业十年来之进步[J].图书馆学季刊,1936(4):526.(Li Xiaoyua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librarianship in recent 10 years[J]. Library Quarterly,1936(4):526.)
- [20] 刘咸焯.刘咸焯学术论集·校雠学编[M].黄曙辉编校.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45-49.(Liu Xianxin. Jiao chou xue[M]. Huang Shuhui, anno.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10:45-49.)
- [21] 向宗鲁.校雠学[M].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Xiang Zonglu. Jiao chou xue[M]. Chongqing: The Commercial Press,1944.)
- [22] 胡朴安,胡道静.校雠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36-37.(Hu Pu'an, Hu Daojing. Jiao chou xue[M].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1934:36-37.)
- [23] 汪辟疆.目录学研究[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51,53.(Wang Pijiang. A study of bibliography[M].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1934:51,53.)
- [24] 蒋元卿.校雠学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107-110.(Jiang Yuanqing. History of Jiao chou xue[M].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1935:107-110.)
- [25]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86-107.(Yao Mingda. History of China's bibliography[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2014:86-107.)
- [26] 程伯群.比较图书馆学.杜定友校订.上海:世界书局,1935:杜序.(Cheng Boqun. Comparative Library Science[M]. Du Dingyou, anno. Shanghai: World Publishing House,1935:preface of Du.)
- [27] 梁启超.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N].晨报副刊,1925-6-2(2).(Liang Qichao. The speech in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Chinese Library Association[N]. Chenbao fukan,1925-6-2(2).)
- [28] 杜定友.校雠新义[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自叙.(Du Dingyou. Jiao chou xin yi[M]. Shanghai:

-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1991: preface)
- [29] 范凡.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与学术传承[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1: 223. (Fan Fan. The publishing and academic heritage of the library science works in the Republican era of China[M].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11: 223.)
- [30] 钱亚新. 郑樵校雠略研究[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8. (Qian Yaxin. Study of Zheng Qiao's jiao chou lue[M].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48.)
- [31] 钱亚新. 我国图书馆学的奠基人——郑樵[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0(3): 93-102. (Qian Yaxin. Zheng Qiao—the founder of China's library science[J]. Journal of Anhu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980(3): 93-102.)
- [32] 顾颉刚. 顾颉刚日记: 卷六[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Gu Jiegang. Gu Jiegang's diary: vol.6 [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1.)
- [33] 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目录学概论》编写组. 目录学概论[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81. (Wuhan University, Peiking University. An introduction to bibliography [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2: 81.)
- [34] 徐有富. 郑樵评传[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72. (Xu Youfu. A critical biography of Zheng Qiao [M].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272.)
- [35] 黄宗忠. 图书馆学导论[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8: 96. (Huang Zongzhong. An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M].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1988: 96.)
- [36] 桑健. 图书馆学概论[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5: 583-584. (Sang Jian. An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M]. Shenyang: Liaoning People's Press, 1985: 583-584.)
- [37] 况能富. 东西方图书馆学奠基者事略[J]. 图书情报工作, 1983(6): 35. (Kuang Nengfu. The biographies of founders of eastern and western library science[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1983(6): 35.)
- [38] 倪波, 高建. 论郑樵[J]. 福建省图书馆学会通讯, 1981(2): 55. (Ni Bo, Gao Jian. A discussion on Zheng Qiao [J]. Journal of Fujian's Library Association, 1981(2): 55.)
- [39] 郑奋鹏. 郑樵的校雠目录学研究[M]. 台北: 学海出版社, 1983. (Zheng Fenpeng. Study of Zheng Qiao's bibliography[M]. Taipei: Xuehai Press, 1983.)

谢欢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江苏 南京 210023。

(收稿日期: 2017-06-05; 修回日期: 2017-07-06)